

河姆渡文化特展亮相国博

看看考古发现里的“江南水乡”

本报记者 李冰洁

今年是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日前，“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展览中，展出了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在内的324件(套)河姆渡出土文物，生动呈现河姆渡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引领观众走进河姆渡，直观感受稻羹鱼、万物有灵的远古江南风情。



▲ 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000年)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2厘米。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 猪纹陶钵，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000年)高11.7厘米；口沿长21.7厘米，宽17.5厘米；底长15厘米，宽13.5厘米。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两件核心文物首次亮相京城

“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最吸引观众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和猪纹陶钵，它们是河姆渡文化的核心文物，出土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在北京亮相。

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是一件象牙雕刻品的残片，属于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艺术珍品，于1977、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

其正反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由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外围周边刻着炽烈蓬勃的火焰纹，象征太阳光芒。两侧对称刻出一钩喙双鸟，似在引吭啼鸣。蝶形器的边缘衬托着刻工精细、线条流畅的羽状纹。除了鸟和太阳纹中心以圆锥状钻之外，两鸟两侧各对称钻通3个圆孔，整个蝶形器上一共有6个圆孔，上四下二。

观众从这件象牙蝶形器所刻制的图案中，可以管窥原始河姆渡人对鸟的喜爱和对太阳的崇拜。

猪纹陶钵可以说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整个器形呈长方形，四角弧圆，平底。夹炭黑陶制成。钵外壁上分别以写实的手法、均匀的线条刻绘了猪纹，猪纹的整个造型形态逼真，四足踟蹰而行，头向前垂，双目圆睁，正在寻觅食物。猪的

鬃毛簇立，小尾下卷与身上的图案混为一体，相当协调。这种处理充分反映了河姆渡人艺术构思的奇特和审美情趣的淳朴。猪的刻画造型，表明了河姆渡人在原始绘画艺术的技巧上已相当熟练，绘制的笔法也十分简练，不仅猪的形象逼真，而且神韵天真。

“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分为“古渡新声”“潮起东南”“探海溯源”3个部分，共展出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井头山遗址等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贝器、

木器、编织物等324件(套)文物，涵盖丰富的稻作遗存、成熟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独特的夹炭陶器和精美的手工艺品等河姆渡文化重要标志性考古成果，生动呈现河姆渡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引领观众走进河姆渡古人生活，直观感受稻羹鱼、万物有灵的远古江南风情。

50年前的重大考古发现

据国博策展人陈克双介绍，河姆

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是中国史前文明的突出代表。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浙江东北部的宁绍地区东部和舟山地区。

1973年，河姆渡遗址初露端倪，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片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为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进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奠定了河姆渡文化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中的特殊地位。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之一，其发现和确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为重建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历史打开了一扇清晰的窗口。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河姆渡文化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几乎家喻户晓的一支。时至今日，河姆渡文化仍在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干栏式木构建筑起源、南方地区史前聚落形态等历史研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最新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

展览中还展出了成盒装的蚌壳、蛤蜊壳、蛏子壳、满月贝、海螺……这些文物来自2013年在河姆渡和田螺山两大遗址附近的井头山遗址。这一史前贝丘遗址的发现，将宁波地区人文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2013年夏，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的井头山遗址，地质钻探土样被雨水冲刷，露出了贝壳、陶片和动物碎骨，被一位放羊村民收集后送到了附近考古队。由此追溯到了河姆渡遗址的“先辈”。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300年至7800年，是我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滨贝丘遗址，为探寻河姆渡文化的源头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展厅里，还展出了许多近年来河姆渡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丰富的稻作文化和木构建筑遗存，众多的木器、骨器、陶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尤其是鱼类遗骨……这些都出土于2001年，在河姆渡遗址附近发现的、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河姆渡文化聚落遗址。这些文物证明河姆渡先民居住的环境依山傍水，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又有稻米作为主食，堪称中国最早的“鱼米之乡”，是远古江南的代表。

可以说，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源头，这里既有大量人类食用海产品的遗存，又出土了木桨、鱼罩等可用于渔业生产的工具。有专家指出，在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意味着河姆渡文化考古承担了探索中国海洋文化的使命。

农渔生活 安然闲逸

——清骨雕农渔生活鼻烟壶欣赏

李莹清



▲ 清骨雕农渔生活鼻烟壶。武汉博物馆藏。

武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骨雕农渔生活鼻烟壶，高6厘米，扁圆形。翡翠盖带勺，束颈溜肩，鼓腹圆足。瓶身以动物骨骼雕琢而成，局部有裂纹。

两面腹部主题纹饰为农渔生活画面，一面是农人耕作间隙小憩场景，只见庄稼地边，一位头戴毡帽的农民坐在石头上，面目慈祥而善，双手环抱于胸前，双腿并拢，面向一侧，似在与旁边临水垂钓的老翁闲谈农事，一柄长长的锄头斜放在身边，可见农民锄地疲乏，在小憩的片刻间，不忘与钓者闲话，其乐融融。

另一面为老翁垂钓于河边的场景，河上水波潋滟，河畔水草萋萋，老翁头戴宽大的斗笠，袍袖挽至手肘，背后放着一只鱼篓。老翁在岸边坡地上席地而坐，双手放置于膝上，一根竹子制成的钓竿插在地上，上部高高翘起，钓线垂于河面。老翁没有手执钓竿，而是侧脸而视，与小憩的农民正开心闲聊，毫不顾及是否有鱼儿上钩，颇有几分明代诗僧吴鼎芳笔下钓者“搔首对斜阳，纶竿久不理”的意蕴。

从画面中可以窥见工匠对人物神态刻画的独具匠心：农民俯视、钓者仰视的神态举止，也显示了农民、钓者所坐地方的一高一低，充分突出了工匠注重细节的细致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把握场景的准确

性，使场面显得真实而生动。

历史上，渔樵耕读分别与四位古人有关，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子陵，一生拒绝出仕，隐居于浙江桐庐富春江畔，垂钓终老，是东汉著名隐士，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语赞誉。西汉大臣朱买臣，出任前家境贫寒，曾是以卖柴为生的樵夫。“耕”与舜有关，他曾经在历山之下辛勤地耕田种地。“读”则来自“佩六国相印”的苏秦铁锥刺股励志苦读终有大成的典故。明人任环曾写过四言格律诗《渔樵耕读》四首：“明月扁舟，芦花浅水。鱼无深愁，漫兴而已。云山砍破，挑此一肩。留依新松，以待参天。一犁春雨，万顷秋风。击壤而歌，伊谁之功。刺股悬梁，囊萤映雪。达之思兼，穷亦归洁。”

古代文人崇尚这四位古人渔樵耕读的生活方式，这在一些艺术品上屡屡可见，这件鼻烟壶选取了其中的渔、耕两种，形象自然，场面和美。

这件鼻烟壶以动物骨骼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与线雕相结合，刀法娴熟，刻画细腻，线条流畅。整体器物造型别致，磨制精湛，光洁透亮，人物形象写实，栩栩如生。画面和谐，悠然惬意，反映了乡村田园生活宁静美好的一面。

梁世雄向广州美术学院捐赠作品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在广州美术学院70周年校庆之际，年逾九旬高龄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梁世雄，偕同夫人、容庚之女容璞，向校方捐赠了60件、16套画作。《梁世雄全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赠书仪式同场举行。

近年来，梁世雄及其家属陆续整理出大批不同年代创作的美术作品与文物收藏，频频向国家进行大量捐赠。仅在去年，梁世雄、容璞捐赠的作品与藏品，就达到259套、779件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

先后捐赠200余件青铜器，1200余件(套)历代书画，1万余套(册)古籍善本，千余件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还有大量著作手稿、刻本、抄本……数量之多，令人惊叹。2020年，经过全国多家文博机构与学者通力合作，“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梁世雄、仲惠父、刺鼎、《兰亭八十刻》《金文编》手稿……每一件文物都是容庚毕生收藏研究的心血结晶。

据了解，此次梁世雄所捐赠作品也将在近期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山在望——梁世雄捐赠作品展”与公众见面。

“池半升”池浴德

本报记者 照宁

德，是明代著名的廉吏清官。池浴德(1539年—1617年)，字仕爵，人称明洲先生，明代厦门同安县嘉禾里中左所(现厦门湖里区江头街道)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举人，翌年考中进士。池浴德一生

恪守“矢心天日，不负苍生”的理念，历任遂昌县令、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北京吏部稽勋司、考功员外、考功郎中、太常寺少卿等职。所到之处以秉公行事、勤政清廉著称。

池浴德首次任职为浙江遂昌县的县令，到任时县衙积案300余件，狱中更是人满为患。池浴德到任后立刻处理堆积如山的案件，他先将所有案件依照年份、案情的轻重缓急汇编成录，分门别类进行办理，很快便将积案清理一空。此时一些平时受了冤屈而又打不起官司的百姓听说遂昌县来了一位公正贤明的知县，纷纷赶来申诉。池浴德都一一受理，并始终坚持办案分文不取，仅需百姓自己带半升米，做路上的干粮，即可结案安业。如此清风亮节之举，令他颇受百姓的爱戴，民间至此亲切地称池浴德为“池半升”。

池浴德办事公道，邻县遇到难办的事都请他去帮忙处理。当时土地兼并的现象极为严重，“浙中钱谷多被富豪干没，往籍难稽”，池浴德受委托到现场丈量田地，无一差漏，然后编成黄册，豪强受到压制，百

姓无不欢欣鼓舞。后来，朝廷晋升池浴德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临行那天，全遂昌县的男女老少“前后绕拥”，赶来送行，争着来抬轿子，“环车而泣”。到了龙游县之后池浴德改乘船只，有“万人曳舟，三日不得去”，最后他只得半夜解开缆绳，悄悄离开。事后，老百姓自发集资在江边盖了一座石亭，名为“曳舟亭”，题有“江水比思犹有底，溪云护石更无心”两句诗，可证池浴德勤政惠民的良好作风。

在吏部任职时，池浴德清廉自律，从不收取不义之财，有不少人向他行贿求官，结果都受到严厉呵斥。初入官场时，他的父亲就时常告诫他，要勤廉清白。1570年，池浴德的父亲池杨去世，他从遂昌赶回去奔丧，他的母亲和伯父悄悄打开他的行李查看，里面只有一些碎银子。池浴德不仅为官恪守“俭勤清白”之训，卸任返回厦门后坚持“蔬食布衣，宴客不重肉”，常教导后辈“毋惹事，毋衣罗绮，毋想膏粱”。

池浴德曾有诗曰：“数茎菊绽香初远，百仞风高石亦寒。”正如他感叹的香菊一般，他的清廉家风也绽放于历史长河里，馥郁至今。



在厦门湖里区的江头公园内，有一组特殊的石刻，展现的是一名官员正在升堂断案的生动场景，其人物石像目光坚毅，背后的石刻屏风上均为莲花纹样，寓意着秉公执法、高风亮节。这位官员名为池浴



明万历清谨堂乐女墨



明代万历年间，徽墨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争相制墨。明代织造内臣孙隆制作了多种署名“清谨堂”的墨品贡入宫中。

此明万历清谨堂乐女墨作美人形，乐女背倚太湖石，抱阮作弹拨状，通体作漆衣。背面阳文楷书“清谨堂”三字，“清”字略有磨损。此墨造型风雅别致，是明墨中的精品。

明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曾载：“织造内臣孙隆清谨堂墨款式精巧，剂料极一时之选，曾进上方，神宗爱重之。”

▲ 明万历清谨堂乐女墨，高6厘米，最宽2.2厘米，厚1.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